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

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 石板墓文化

〔俄罗斯〕A. П. 策比克塔洛夫◎著

孙危◎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

〔俄罗斯〕A. Д. 策比克塔洛夫 著

孙危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 / (俄罗斯) 策比
克塔洛夫著; 孙危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100-16703-1

I. ①蒙… II. ①策… ②孙… III. ①墓葬(考古)—
文化研究—蒙古、俄罗斯 IV. ①K883.118.84
②K885.12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2986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
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
(俄罗斯) A. Д. 策比克塔洛夫 著
孙危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6703-1

2019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2

定价: 78.00元



官方豆瓣：商印文津文化

官方微博：@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

责任编辑：程景楠

版式设计：智善天下

封面设计：武守友

А. Д. Цыбиктаров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я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

© 1998 by Улан-Удэ

(本书根据国立布里亚特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译出)

总序

我们的期待

我们期待《汉译丝瓷之路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切实扩大中国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许多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课题，中国学者从未涉足，甚至闻所未闻。有涉及者，也不是从研究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显而易见，即使我们只想研究自己比较熟悉的东部，也必须了解西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不可能将东部和西部完全割裂开来。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了解和较全面地掌握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以及国外学者理解和运用这些资料的方法。尤其是非汉语资料。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和体会国外有关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理论和学说。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我们找出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的缺环、空白，发现这一学科的发展趋势，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减少盲目性，不仅知当务之急，也高瞻远瞩，有全面的规划和长远的打算！

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有助于中国学者通过发现志同道合的外国学者，以便组成联合阵线，携起手来，共同深入探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时

至今日，学术研究应该可以破除中外之别，特别在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事实上，只有中外学者通力合作，才有可能使研究更上层楼。

我们期待本丛书和商务印书馆正在编辑、出版的《丝瓷之路》学刊和《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相互补充，逐步形成一个丝瓷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物的平台，更好地为学界同仁服务。

不言而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能急躁冒进，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们能力很差，水平很低，因而殷切期待大家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有更多的学者关心这套丛书，我们就有信心将她编好。

编者

2016年8月26日

序

/ 魏 坚

辽远广袤的欧亚草原地带是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生息繁衍的摇篮，同时也是畜牧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考古学界和国外，特别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渐深入，许多过去的学术热点课题又被重新予以重视，新的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这其中，来自中国北方的俄罗斯、蒙古国的考古资料也在学界同仁的努力下，不断被翻译和出版，对我国考古学界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危翻译的俄罗斯考古学家 A. Д. 策比克塔洛夫所著《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1998）一书的出版，就是极好的例证。

石板墓作为中央亚细亚东部地区古代居民的一种最为普遍和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大约在 18 世纪初就引起了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者的注意，其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到 20 世纪末，经过发掘的石板墓数量已接近 700 座，而对这类文化遗存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是由俄罗斯和蒙古两国的考古学家来完成的。

1743 年，大学生 A. 郭尔拉诺夫受 Г. Ф. 米列尔和 И. Г. 格梅林的委托，首次对石板墓进行了具有学术目的的考古发掘。及至 19 世纪，Г. И. 斯帕斯基、M. 格杰尼什托尔姆、M. A. 卡斯特列尼、K. 里特尔和 B. B. 拉德洛夫继

续对石板墓展开调查、发掘和研究。^[1] 作为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国森林草原地带最常见的考古遗迹之一，进入 20 世纪以来，苏联和蒙古国的考古学者逐步开始关注这类属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石板墓遗存，特别是在 30 至 60 年代，诸多学者对石板墓遗存的发掘和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开始对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境内的石板墓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研究。苏联科学院布里亚特—蒙古考古调查团在著名考古学家 Г. П. 索斯诺夫斯基的率领下，曾对布里亚特境内的石板墓遗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在对石板墓遗存特点做出较为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类型学研究。这期间，在对若干墓地中的上百座墓葬材料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就石板墓的分期、年代范围和民族属性等问题提出了多种观点。Ю. Д. 达里科—格林采维奇、Г. И. 波洛弗卡和 Г. П. 索斯诺夫斯基对于石板墓的研究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著名考古学家 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和 С. В. 吉谢列夫也对石板墓的相关学术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2]

但是，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欧亚草原东部的亚洲草原地带，即萨彦岭—阿尔泰、哈卡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西伯利亚以及哈萨克斯坦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对中央亚细亚地区，即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地区草原地带所进行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研究的关注度有所降低。显而易见，这与石板墓考古的基础材料相对薄弱是紧密相关的。由此，针对石板墓遗存及相关问题所提出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实际是由于众多学者对中央亚细亚地区青铜时代至早

[1] Гришин Ю. С., Памятники неолита,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ов лесостеп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 - М.: Наука, 1981. - С.6-12. (Ю. С. 格里申:《外贝加尔森林草原地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6—12 页。)

[2] Диков Н. Н.,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Забайкалья. Улан-Удэ: Бурят. кн. изд-во, 1958. (Н. Н. 季科夫:《外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时代》，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图书出版社，1958 年。) Гришин Ю. С., Памятники неолита, бронзового и раннего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ов лесостеп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 - М.: Наука, 1981. (Ю. С. 格里申:《外贝加尔森林草原地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 年。) Волков В. В., 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а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 Улан-Батор, 1967. (В. В. 沃尔科夫:《蒙古北部的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乌兰巴托，1967 年。) Новгородова Э. А., 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 - М.: Наука, 1989. (Э. А. 诺英格洛多娃:《古代蒙古》，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 年。) Наваан Д., Дорнод Монголийн хурлийн үе.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75. (Д. 纳瓦安:《蒙古的青铜时代》，乌兰巴托，舒阿特和出版社，1975 年。)

期铁器时代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认识有所不同所致。所有这些，都给我们解决中央亚细亚、南西伯利亚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毫无疑问，A. Д. 策比克塔洛夫所著《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1998）一书的出版，对于解决中央亚细亚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各类型遗存的年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诸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A. Д. 策比克塔洛夫，历史学博士（Ph.D），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功勋文化工作者。1955年出生于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区夏尔郭勒村，1977年毕业于托木斯克国立大学，1977—1979年就职于布里亚特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民族和考古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80—1990年就就职于赤塔民族志博物馆，1990—1995年任教于托木斯克州，从1996年至今任教于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历史学院布里亚特历史与文化系。《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1998）一书是策比克塔洛夫于1989年在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此后他还著有《布里亚特史（从远古到17世纪）》（1999）、《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央亚细亚（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2006）等，另编有《布里亚特通史（第一卷）》（2009）和诸多相关学术论文等。因此策比克塔洛夫是中央亚细亚考古研究领域的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贝加尔和蒙古国的方形石板墓、赫列克苏尔以及其他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在策比克塔洛夫的这部专著中，作者将此前近三个世纪以来发掘的，广泛分布于贝加尔湖沿岸、外贝加尔和蒙古国境内的共计约600座石板墓（其中542座石板墓、18座形象墓、40个赫列克苏尔遗存），进行了全面收集和系统化的整理研究。因这些材料来自不同时期很多学者的考古发掘，他们所使用的较大的差异，而策比克塔洛夫的整理研究则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并尽量弥补了田野考古工作中出现的偏差。若对策比克塔洛夫的这部专著所获成果做一个归纳的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实际上，石板墓在绝大多数墓地中的数量并不多，而且这些石板墓有些成行排列，有些则分布无序。策比克塔洛夫将与石板墓共存的赫列克苏尔，以及石板墓周围的圆形、方形和呈辐射状分布的遗存和石板墓区分开

来，并认为成行排列的石板墓可能具有祭祀的功能。

第二，石板墓文化与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国境内发现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其他考古学遗存之间具有年代、文化上的联系。这些遗迹有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赫列克苏尔、德沃尔措夫类型墓葬以及形象墓，形象墓从属性上来说亦属于石板墓文化的范畴。

第三，由于盗掘，在已发掘的 542 座石板墓中，约有半数发现有人骨，但仅有 41 座的人骨保存相对完整。石板墓的死者的埋葬方式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即均为仰身葬，头向东。策比克塔洛夫认为石板墓文化的居民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属于蒙古人种，并与该文化所在地区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及之后的匈奴人极为相似。

第四，策比克塔洛夫根据石板墓所出遗物的不同而将其分为六种类型。从数量上来看，无随葬品的和仅随葬装饰品、衣饰的石板墓要更多一些。但有 4% 的石板墓出有武器、带饰、项链和胸饰等，所出的遗物具有权力的特点，策氏认为这类石板墓的墓主乃是享有特权的居民。但这些遗物同样也见于围墙内的相对狭小空间中，因此他也认为，目前还缺乏直接的证据来解释围墙的规模与权力象征物之间的关系。

第五，就武器而言，在石板墓的随葬品中非常罕见。在这本专著所讨论的 542 座石板墓中，仅有 25 座出土了这类遗物，即占墓葬总数的 4.6%。策比克塔洛夫由此认为，战争和其他军事行为在石板墓的葬仪中还体现得不是很明显，因而很少在墓葬中出现。

第六，对石板墓进行编年和分期在这部专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作者在细致分析所获材料的基础上，辅之以各种断代方法，得出：该文化存在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晚期和早期斯基泰时代，即公元前 13 至公元前 6 世纪。

第七，策比克塔洛夫最重要的成果也体现在其对赫列克苏尔一类遗存的研究上。对于其亲自发掘的乌勒兹特 6 号墓地，他明确指出石板墓叠压在赫列克苏尔的围墙之上，因而石板墓的年代要更晚一些，且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他也认为，将赫列克苏尔文化和鹿石文化区分开来还为时尚早，而且与赫列克苏尔文化相关的普通遗存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第八，据墓葬类型和出土随葬品，策比克塔洛夫认为石板墓文化居民的

基本经济活动是从事畜牧业。

当然，也有学者对策比克塔洛夫的一些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胡加科夫认为：在蒙古国北部地区石板墓中就发现过不少的青铜头盔，这种防护武器足以证明石板墓文化居民的军事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石板墓中武器类遗物之所以非常罕见，可能与大规模的盗墓活动相关；用于断代的武器，策氏仅仅关注到了两叶状的青铜镞，其年代为公元前 2 千纪末期，即早期斯基泰时代，但石板墓中出土的三叶状和四棱青铜镞的时代均为斯基泰时代，而弓弭的时代更是要晚至晚期斯基泰时代；形象墓与石板墓分布的范围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可能属于同一类文化遗存。但从德沃尔措夫类型墓葬所出土的遗物来看，其年代与石板墓文化可能不属同一时期，例如青铜三棱镞与中国汉代及匈奴的镞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其既不属于青铜时代晚期，也不可能属于早期斯基泰时代；就赫列克苏尔文化而言，该文化居民中的平民阶层的墓葬广布于中央亚细亚地区，其在年代上要早于石板墓遗存，应与石板墓不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1]因此，石板墓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 10 至公元前 3 世纪。

然而毋庸讳言，《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一书，是一部对中央亚细亚地区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书中收集了非常完整的与石板墓文化相关的资料，并对与该文化相关的一些最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同时亦对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因此可以说，策比克塔洛夫的这部著作是以往三个世纪以来关于石板墓文化研究的独具特色的系统研究论著，并很可能成为对其他地区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研究的参照标尺。

本书的译者孙危 20 世纪 90 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曾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硕士、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目前任职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考古。教学和培养研究生之余，孙危一直致力于俄文考古资料的翻译工作，这些年已先后出版了《匈奴文化与诺

[1] Худяков Ю. С., А. Д. Цыбиктаров.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я и Забайкалья//Восток, 2001. - Вып. 3. - С.175-178. (Ю. С. 胡加科夫：《评 А. Д. 策比克塔洛夫的〈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东方学杂志》2001 年第 3 期。)

彦乌拉巨冢》^[1]、《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2]、《古代蒙古城市》^[3]等学术专著和《乌苏里斯克地区新发现的铭文材料》^[4]、《希腊化时代恰卡尼安的筑城方法》^[5]、《斯基泰野兽风格艺术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6]、《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游牧人遗迹民族属性研究》^[7]等十几篇重要译文。这些资料的翻译出版，部分改善了国内学者在欧亚草原地带考古学研究中，长期短缺俄罗斯和蒙古国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困境，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发展。

当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大大地拓宽了视野，在不断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考古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同时，涉外考古合作项目逐年增加，表现出迅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在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考古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等情势之下，对于既往基础研究资料的需求就显得更为迫切。近几年来，《欧亚译丛》、《边疆考古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等书刊，都相继搭建起了发表翻译论著的平台，推出了一批国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力地配合了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老一辈陈弘法和新一代孙危这些致力于国外最新考古成果译介的学者不断的努力，中国考古学必将在21世纪走向世界。

拖欠已久，匆匆写就，以为序。

2019年2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
- [1] С. И. 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孙危译，马健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
- [2] К. А. 阿奇舍夫、Г. А. 库沙耶夫：《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孙危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
- [3] С. В. 吉谢列夫等：《古代蒙古城市》，孙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 [4] Н. Г. 阿勒杰米耶娃、А. П. 伊弗里耶夫：《乌苏里斯克地区新发现的铭文材料》，孙危译，《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 [5] В. А. 杜尔古诺夫：《希腊化时代恰卡尼安的筑城方法》，孙危译，《飞翔的中国凤凰：中西文化交流史译文集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 [6] Г. Н. 古洛奇金：《斯基泰野兽风格艺术与洛雷斯坦青铜器艺术》，孙危译，《欧亚译丛》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
- [7] Ю. А. 扎德涅普洛夫斯基：《七河地区发现的乌孙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游牧人遗迹民族属性研究》，孙危译，《欧亚译丛》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

致 中 国 读 者

/ A. Д. 策比克塔洛夫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石板墓文化所做的评述。该文化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覆盖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黑海沿岸地区。在这一广阔空间内，公元前 2 千纪至公元前 1 千纪初，存在着几个强大的联盟，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俄罗斯及以前的苏联考古学界，这些考古学文化被认为具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共性。这些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时性和类似的发展方向这两个特点。在东欧草原地带，具有木椁墓文化的历史共性；在中亚地区，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共性。而在那些属于高山草原的地带，如蒙古西部、图瓦和阿尔泰东南部地区生活的部族，则按照无随葬品的葬仪来埋葬自己的亲人。赫列克苏尔文化就是这些具有共性的文化中的一个，在该文化以东的中央蒙古、东部蒙古和外贝加尔南部的高山草原和平原地带，则广泛分布着石板墓文化。

石板墓文化的研究史可谓独具特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即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80 年代，该文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石板墓文化的时代属斯基泰时代，即公元前 7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学界才确定，石板墓文化在斯基泰时代已结束了其发展进程，而

该文化的形成时期是在青铜时代的成熟阶段，即公元前 2 千纪中期。^[1]目前已经弄清楚了如下事实：石板墓文化的居民与赫列克苏尔文化的创造者共同决定了蒙古草原以及与之毗邻的外贝加尔南部、图瓦和戈尔诺—阿尔泰地区，自公元前 2 千纪中期至公元前 1 千纪中期这长达 1000 多年的民族文化态势。

在石板墓文化和赫列克苏尔文化存在的时期里，在中国境内也存在着两个强大的王朝，即商和周。这两个王朝的北方与那些草原游牧民族所分布的区域交界，这些民族是包括鄂尔多斯、中国的戈壁地带和东北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和东北草原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创造者的后裔。创造这些文化的居民同样也与石板墓文化、赫列克苏尔文化的创造者，即草原畜牧文化的创造者比邻而居。对下面这个事实我们不应感到怀疑：中国的古代居民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以畜牧业为生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是石板墓文化中常见的三足陶器，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将这种器物称之为礼器。而早在新石器时代，礼器就已出现在中国，并成为古代中国文明显示族系的象征。

在关于中央亚细亚和东亚地区历史的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有一个是这些地区的居民之间所存在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联系。不过与中国境内的居民不同，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生活在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带的居民自身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相应的，他们的历史也就失去了富含着信息的文献记载。因此对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研究的基本材料来自于考古学。作为本书的作者，要表达出的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这些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掘且已刊布的石板墓和赫列克苏尔材料，能使中国读者获得对于古代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以畜牧业为生的居民充分全面的认识。我还希望，此书能使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与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带之间的互动研究达到一个

[1] A. Д. 策比克塔洛夫：《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 2 千纪至公元前 1 千纪前期）的中央亚细亚地区》，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摘要，新西伯利亚，2003 年，第 22、25—26、40、43 页；A. Д. 策比克塔洛夫：《从蒙古和外贝加尔南部地区发现的考古学和古地理学材料看中央亚细亚地区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的形成及其对青铜时代居民文化、历史发展的影响》，载《北亚地区民族史、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国立伊尔库茨克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94—198 页。

新的水平。

在此我要对两位历史学博士、教授——马健和孙危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主动将拙著介绍给中国久负盛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来出版，后者还亲自将拙著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也付出良多。我还要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糜绪洋，他在本书出版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使我与马健教授、孙危教授以及商务印书馆之间的联系非常顺畅！

2018年8月20日